

经典



杰拉德·维兹诺

2014年2月,年届八十的当代著名美国本土裔作家杰拉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 1934-)出版了第12部长篇小说《蓝鸫》,这也是他第一部冠以“历史小说”标题的作品。小说的历史线索是1907年至1924年,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讲述了本土裔白土族的博利乌兄弟(巴希尔与阿洛伊修斯)及该族保留地上其他成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这部285页的历史小说按历史纪年分为24章,前10章讲述战前白土族人为保存和发扬族裔文化传统,在“主流”话语中宣示“本土裔在场”(即昭示在“主流”历史叙事中经常被抹杀或边缘化的本土裔印第安人在人类历史各个阶段的参与和贡献)而做的各种努力;在随后的7章中,他们应征入伍,加入美国特遣部队,前往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最后7章则围绕这些本土裔士兵的战后生活展开,讲述他们回国后难以适应保留地生活,遂决定重返法国,继续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整个情节在历史纵轴上,辗转来回于保留地、保留地外的美国社会及法国之间,在展示广阔的社会、历史、人文背景的同时,更以虚构的方式,集中凸显了本土裔人民在一战中的“在场”。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被称为“历史小说”的虚构作品,从题材到大部分细节都建立在有凭有据的事实之上。一战主战场在欧洲,美国政府于1917年决定加入英法阵营对德国作战。而此时,大多数美国本土裔人尚未获得公民身份。尽管如此,占当时本土裔总人口数20%-30%的青壮男子(保守估计有12000名)入伍,离开保留地或其他居住地,前往遥远的欧洲,代表美国作战。这些本土裔士兵往往被派最危险任务,如扫雷、侦查、突击分队等,其直接后果就是有5%的本土裔士兵阵亡或伤残(而其他美国士兵的伤亡率仅1%)。《蓝鸫》中提到的战役战斗、参加及阵亡的本土裔士兵,都在历史和记录上有案可稽,而讲述这场战争的,并不是一位全知的叙事者,而是小说人物的叙述片段,搭载了“弗农号”横渡大西洋到达法国港口,在马恩河畔营地驻扎,稍事训练即被派往战事最为吃紧的前线,伏击德军,首次夜战的紧张心情与战友为敌的混乱,刺杀德国士兵时的决绝果敢,战友和亲人毫无意义的阵亡,等等。

然而,这部在细节真实上几乎做到极致的“历史小说”,其主题或创作目的似乎并不在“展现”或“重述”历史,甚至不在“从本土裔的角度”重述历史,而是要借人物口中与作者笔下的历史,叙写本土裔人民在历史和文明进程中

杰拉德·维兹诺: 宣示“本土裔在场”的后现代叙写

□张 冲

的“在场”,还原本土族裔人民在数百年的欧美历史书写中几乎消失的存在、参与和贡献。

《蓝鸫》中,本土裔的“在场”几乎遍布各个细节。小说伊始讲述了主人公博利乌兄弟入侵欧洲留下的后裔。尽管哥伦布在欧洲出生成长,对自己的印第安基因毫不知情,但当他一踏上北美大陆遇见印第安人时,一种难以名状的“回家”亲切感油然而起。尽管这只是小说的铺垫性细节,但维兹诺在虚构作品中用本土裔的历史叙说对话乃至覆盖“主流”历史书写的努力已然开始。

当然,维兹诺小说最具独特性的成就依然是其“恶作剧者”系列。“恶作剧者”是美国本土裔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他兼具聪明、机智、幽默、卑下、无聊、荒诞、好使坏等各种特征,同时还能在人类与动物之间随意变换。维兹诺在上世纪80年代曾在我国天津的一所高校任教,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接触,使他意识到中国《西游记》里的“猴王孙悟空”与本土裔传统文化里的“恶作剧者”之间的种种类似,从而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出版于1986年的长篇小说《忧伤者》(一位美国猴王在中国)(获1988年美国图书奖)以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为线索写成,其主人公就是一位颇具“恶作剧者”特征的美国教授,维兹诺由此开始了“恶作剧系列”,先后出版了《为自由的恶作剧者》《哥伦布的后代》《死者之声》《热线性疗伤》《葬撞》《白土族的裹尸布》《流泪系主任》等长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为主要人物出现的,均是具有混血背景的恶作剧者,他们或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刻观察,或对束缚压力进行反抗,或艰苦努力成就事业。这些作品用各种看似荒诞的情节和人物,通过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寻求、复植和发扬光大本土裔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恢复本土裔人民被歪曲的传统和形象,并颠覆着“主流”的叙事与历史观,而这些作品叙事充满后现代及魔幻色彩的叙事风格,同时也挑战甚至颠覆了传统的阅读、理解与研究方式。

长篇小说只是维兹诺作品的一部分。1970年出版的《春之夏:阿尼施纳贝人抒情诗与故事》(阿尼施纳贝人亦称奥吉布瓦人或齐佩瓦人)与1991年出版的《渣土填埋场的沉思:短篇小说集》,集中体现了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作为杰出的散文家,维兹诺撰写了不少关于奥吉布瓦以及其他印第安人生活和历史的文章,多收于《永远的天空》和《被称为齐佩瓦的人民》两部文集中;作为诗人,维兹诺不仅出版有《几乎上岸》和《乌鸦的恩赐》等诗集,还先后出版了6部俳句诗集,尝试用英语来传达类似日本俳句所表达的情感和风格;他的文化论著包括《内心景观:自传神话与隐喻》《本土自由:自然理性与文化主权》《命定行为:后印第安生存叙事》等;他还编辑了《美国本土裔文学选集》《叙事机会:美国本土裔文学的后现代话语》《本土裔故事叙述家》等重要的文化、文学选集与评论集。维兹诺还将自己的一些作品翻译为法语出版,如《葬撞》与《本土裔故事》等。这一切,都使维兹诺成为当代作家数量最丰富、文类最齐全的美国本土裔作家,特别是他独特的虚构文学作品,从主题、内容到叙事风格,都极大地丰富了当代美国文学的视野与表现力。

统价值基因来拯救世人的故事,而名为“斯通·哥伦布”的小说主人公正是“发现”北美大陆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后裔。颇具喜剧性颠覆意义的是,在维兹诺的历史叙写中,哥伦布竟是当年美洲玛雅人入侵欧洲留下的后裔。尽管哥伦布在欧洲出生成长,对自己的印第安基因毫不知情,但当他一踏上北美大陆遇见印第安人时,一种难以名状的“回家”亲切感油然而起。尽管这只是小说的铺垫性细节,但维兹诺在虚构作品中用本土裔的历史叙说对话乃至覆盖“主流”历史书写的努力已然开始。

当然,维兹诺小说最具独特性的成就依然是其“恶作剧者”系列。“恶作剧者”是美国本土裔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他兼具聪明、机智、幽默、卑下、无聊、荒诞、好使坏等各种特征,同时还能在人类与动物之间随意变换。维兹诺在上世纪80年代曾在我国天津的一所高校任教,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接触,使他意识到中国《西游记》里的“猴王孙悟空”与本土裔传统文化里的“恶作剧者”之间的种种类似,从而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出版于1986年的长篇小说《忧伤者》(一位美国猴王在中国)(获1988年美国图书奖)以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为线索写成,其主人公就是一位颇具“恶作剧者”特征的美国教授,维兹诺由此开始了“恶作剧系列”,先后出版了《为自由的恶作剧者》《哥伦布的后代》《死者之声》《热线性疗伤》《葬撞》《白土族的裹尸布》《流泪系主任》等长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为主要人物出现的,均是具有混血背景的恶作剧者,他们或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刻观察,或对束缚压力进行反抗,或艰苦努力成就事业。这些作品用各种看似荒诞的情节和人物,通过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寻求、复植和发扬光大本土裔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恢复本土裔人民被歪曲的传统和形象,并颠覆着“主流”的叙事与历史观,而这些作品叙事充满后现代及魔幻色彩的叙事风格,同时也挑战甚至颠覆了传统的阅读、理解与研究方式。

长篇小说只是维兹诺作品的一部分。1970年出版的《春之夏:阿尼施纳贝人抒情诗与故事》(阿尼施纳贝人亦称奥吉布瓦人或齐佩瓦人)与1991年出版的《渣土填埋场的沉思:短篇小说集》,集中体现了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作为杰出的散文家,维兹诺撰写了不少关于奥吉布瓦以及其他印第安人生活和历史的文章,多收于《永远的天空》和《被称为齐佩瓦的人民》两部文集中;作为诗人,维兹诺不仅出版有《几乎上岸》和《乌鸦的恩赐》等诗集,还先后出版了6部俳句诗集,尝试用英语来传达类似日本俳句所表达的情感和风格;他的文化论著包括《内心景观:自传神话与隐喻》《本土自由:自然理性与文化主权》《命定行为:后印第安生存叙事》等;他还编辑了《美国本土裔文学选集》《叙事机会:美国本土裔文学的后现代话语》《本土裔故事叙述家》等重要的文化、文学选集与评论集。维兹诺还将自己的一些作品翻译为法语出版,如《葬撞》与《本土裔故事》等。这一切,都使维兹诺成为当代作家数量最丰富、文类最齐全的美国本土裔作家,特别是他独特的虚构文学作品,从主题、内容到叙事风格,都极大地丰富了当代美国文学的视野与表现力。

天涯异草

巴尔扎克餐厅位于巴黎拉丁区学府街,是诸多文化界人士聚餐谈天的热闹去处。已故英籍作家韩素音的大女儿唐蓉梅从纽约来法国,以她故世母亲的名义邀请我和妻子董纯相聚,陪同前来的还有耶鲁“儿童乐园基金会”主席玛丽-让娜·吕耶。

韩素音的这个女儿叫蓉梅,1940年2月生于四川成都,故以“蓉”和早春梅花绽放吐香得名,诗意满溢。据玛丽-让娜介绍,韩素音是一位非常慈祥的母亲,生前对养女蓉梅关爱备至。

席间,蓉梅和玛丽-让娜谈韩素音一生30余部作品在全球的广泛影响,尤其是《瑰宝》(A Many Splendoured Thing)。韩素音的父亲周映彤是中国第一代庚款赴欧留学生,母亲玛格丽特为比利时贵族女子。《瑰宝》充盈着“欧亚混血意识”,细腻而真切地描绘了中西不同人物在文明冲突中精神信仰上的撕扯。特别是她本人跟英国记者马克·艾略特(真名伊恩·莫里斯,英国《泰晤士报》战地记者)热烈而又凄婉的恋情,读的催人泪下。《瑰宝》一时轰动西方世界,为韩素音赢得了国际声誉。在诗性叙事和思想深度方面超过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名作家赛珍珠的《大地》。1955年,美国20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将《瑰宝》搬上银幕,取名《生死恋》,获奥斯卡奖。这在一向以意识形态的偏执定取舍的西方艺坛是极为罕见的。

玛丽-让娜强调,中国是韩素音的“酷爱”和“船籍港”(le port d'attache)。她引用故人的话说,中国“是我心中的国度”。确实,韩素音的“中国情结”流溢在《瑰宝》全书,而且跟她对养女蓉梅的期望联系在一起。韩素音1949年7月旅居香港时,同女友玛雅·冯艾谈自己回国的打算,她说:“我不愿意看到她变成没有祖国的假洋鬼子。任谁都不能把我留在香港,谁都不能让我离开祖国,即使是我的女儿。”

这里,韩素音明确中国是她的祖国,尽管自己受西方影响很深,她对信仰基督教的情人马克·艾略特也这样说:“我明年就要回中国去大陆了。因为我求学就是要为祖国做贡献。”她送妹妹素尘上邮轮渡洋去美国时,妹妹觉得韩素音“好像是生活在太空里的人”,提到美国一家医院曾要过姐姐的学位文凭,劝她去美国,说:“你真傻,干吗要拒绝呢?替梅想想,她可是你的女儿”

蓉城梅花吐芳馨

□沈大力

呀!想想她的未来。”韩素音想的却是:“我不能走,我不能想象我能离开这片梅的父亲,我,还有梅已经深深扎下我们根须的土地。我不能想象她去当一个被拔掉了根的‘白华’,在陌生的土地上做一个异乡人,一辈子只能神游身后的故园。”

这番话不仅表达了韩素音对中国的热爱,也显示出真挚的母女之情。在《瑰宝》一书里,蓉梅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被母亲看成自己心中的“幸福之花”,昵称为“梅”。可见,韩素音视养女为己出。书中有一段关于她们母女俩的描述:

夜幕降临后,我回到家中,穿上我的蓝色真丝衣服。梅穿上她的淡蓝色天鹅绒珠扣衣裳。我把她的头发梳了一遍又一遍,又系上了两条彩带。她很高兴:“我要给马克看看我的汉语作文,我得了90分呢!”她说着就从抽屉里取出了作文本。

我在涂唇膏,梅仰脸看着我。“今天晚上你真漂亮,我知道,这是因为你很开心。”她说,“我不愿意看到你又累又老的样子。我愿意你永远年轻。”

我女儿和我互相注视着。女人最懂女人的心。

蓉梅跟养母心相印。获悉韩素音的情人马克·艾略特在朝鲜战场驾吉普车触雷身亡的噩耗后,小姑娘在日记里黯然写道:“我有一个朋友,他打算娶我的妈妈,我妈妈也愿意嫁给他。不过,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他死了,真可惜!”

蓉梅是一位朴实谦逊、性情恬静的女性。我们初见面,她话并不多。“您是什么时候认识我母亲的?”她细声探问过往的旧事,引起我一段段回忆。

1997年夏,我出席国际奥委会洛桑“文化论坛”。韩素音邀请我在莱蒙湖畔的“和平大酒店”会面。时值她80岁生日,相见甚欢。记得我用法文书写的第一部小说《悬崖百合》在法国出版时,她特意从瑞士致函巴黎“斯多葛出版社”,表示对书中所述“中国儿童长征”深感震撼。与此同时,她的小说《魔

年支持瑞士“儿童乐园基金会”。1994年,我和董纯曾应邀赴玛尔梯尼参加该基金会为中国儿童影片《天堂来信》的颁奖仪式。

董纯告诉蓉梅,正是她母亲为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建立纪念碑奔走,找了中国驻法大使馆。故人的夙愿业已实现,这幅浮雕像由法国当代罗丹派杰出艺术家保尔·贝尔蒙多雕刻制作。

蓉梅和玛丽-让娜追忆起韩素音辞世前的情景。2012年10月下旬,老作家预感自己不久人世,接连三天静卧在床,不再吃水进食,于11月2日安详离世。玛丽-让娜说,韩素音多次嘱咐她要继续办好“儿童乐园基金会”,用文化艺术滋养下一代成长。蓉梅告诉我们,遵照她母亲遗嘱,现已设立“韩素音文学奖”,专门颁给世界各地在受难中奋争,援笔为母亲写作的母亲。奖项拟在瑞士的圣彼得堡、德·克拉日欧洲图书馆颁发。那里有建于11世纪的罗曼教堂,苍松翠柏下竖立着韩素音的青铜胸像,铜像由瑞士瓦莱州政府铸造。揭幕之日,年迈的韩素音由女儿蓉梅和众多亲友陪同出席。该像基座上镌刻着表达女作家终生意向的铭文:“吾欲在书中引入普世的人性”。

此为往事。韩素音逝世后,女儿不忘慈母的谆谆教导:“要学中文,因为你是中国人”,以及“希望有一天你能回到祖国,回到成都去教书”。蓉梅先将母亲的4000册中文和英文著作赠送给中国,接着,她获悉成都办起一所“四川乡村教师培训班”,毅然从美国起身志愿来华服务,还继续在国内几所大学里教授英语。蓉梅对母亲深怀温情和怀念。她说:“我读完母亲的自传,把书中的母亲和生活里的母亲拼起来,发现她骨子里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也有着自己的悲伤和欢乐。”

追忆韩素音平凡而又崇高的一生,如她自己在《瑰宝》封面上所写:“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波: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瑰宝》法译本封面

当代俄罗斯文学观察

从上个世纪末期以来,随着俄罗斯社会生活及文学生活趋于稳定,一种文学体裁悄然走红并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热潮,这就是作家传记。具有悠久历史的《杰出人物的生活》系列传记丛书在经历了萧条冷落的90年代之后,从1999年开始迅速升温,每年出版的人物传记多达几十种,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作家传记。许多著名的文学研究家、评论家、知名作家纷纷投入到传记写作之中,乐此不疲。例如,俄罗斯国家艺术知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柳德米拉·萨拉斯金娜在完成《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传》并获得2008年度“大书奖”后,又在多年从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作家德米特里·贝科夫凭借《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传》于2006年同时获得“大书奖”和“民族畅销书奖”;评论家巴维尔·巴恩斯作为2005年出版《高尔基传》之后创作的《列夫·托尔斯泰:逃离天堂》获得2010年度“大书奖”;布罗茨基的好友、诗人里沃夫·洛谢夫于2008年出版《约瑟夫·布罗茨基传》;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作家阿列克塞·瓦尔拉莫夫更是醉心于此,接连创作出《阿列克塞·托尔斯泰传》(2006年)、《米哈伊尔·普里什文传》(2008年)、《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传》(2008年)、《安德烈·普拉东诺夫传》(2011)等传记,其中《阿列克塞·托尔斯泰传》获得2007年“大书奖”。年轻的新锐作家普利平也加入到传记写作的队伍中来,于2010年出版《列昂尼德·列昂诺夫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传记体裁在当今受到如此的青睐呢?这可能源于当代俄罗斯文学对非虚构作品的热爱,也应与作家和研究家的创作和研究特点息息相关。2014年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笔者听取了阿列克塞·瓦尔拉莫夫的演讲并对他进行了采访。瓦尔拉莫夫既是莫斯科大学语文学系的教授,又是当代俄罗斯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他在苏联解体之初以中篇小说《诞生》一举成名,获得首届俄罗斯反布克文学奖,之后佳作连连,已有多部作品被译成中文。这样一位风头正劲、颇有现实感的作家为什么会转向传记文学的写作?当笔者问到是否因为对现实生活难以把握或者失去兴趣的时候,瓦尔拉莫夫笑答传记文学其实是她长久以来的夙愿。在随后的读者见面会上,他专门对传记体裁进行了阐释。他对传记创作的兴趣源于早年阅读的《杰出人物传记》丛书。他为此这些人物的命运着迷,也开始思考传记文学的真正意义。他认为无论是伟人的自传,还是有关他们的传记,都会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歪曲真实的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理想的传记就是要竭力小心地剥开那些虚假的层次,看到真实的部分,因为一个人命运的魅力与内涵就包含于此。瓦尔拉莫夫的话道出了许多作家和研究家从事传记文学创作的最主要原因:发现真相,探寻秘密。越与自己心灵契合的作家,就越容易引起这种探究的欲望与乐趣。萨拉斯金娜有一句名言:“艺术家的生平经历是他最完美的作品。”她在对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讲座中,谈到自己从20岁起就开始专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对于她来说,陀氏意味着她的成功与幸福。因为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她与索尔仁尼琴结缘,后被索尔仁尼琴指定为自传作者,而因为写作索尔仁尼琴传记的成功,她又又出版社邀请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萨拉斯金娜有幸为这两位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巨匠书写传记绝非偶然,她是凭借自己满腔的激情与热爱,求真务实的精神态度、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赢得了这两个机会。谈起这段独特经历和过往岁月,她神采飞扬,目光炯炯,清脆、爽朗的语气中洋溢着幸福与神往。

1995年的一天,萨拉斯金娜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的话令她惊喜不已:“我是索尔仁尼琴。”原来,这正是于1994年结束流亡回到祖国的索尔仁尼琴。他说在西方看过萨拉斯金娜写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于是他们开始了交往。“这样过了5年,我想也许我应该写写索尔仁尼琴,因为命运使我认识了他。”她开始用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即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编纂索尔仁尼琴生平和创作年表:时间、事件、证据等,一丝不苟,力争没有谬误之处。这项工作持续了两年。当她拿着近600页的年表请索尔仁尼琴审阅的时候,索尔仁尼琴都感到震惊,说她简直是个工作狂。她愿求索尔仁尼琴接受她的录音采访,这个工作又做了整整3年。2005年,一直出版《杰出人物系列传记丛书》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开历史先河,决定启动为在世名人做传的计划:索尔仁尼琴排在第9位。起初索尔仁尼琴不同意为自己做传,后来当出版社请他自己推荐作者时,他自然而然说出了萨拉斯金娜的名字。从此后,萨拉斯金娜开始了一段她所说的“三人生活”——“我、索尔仁尼琴和我们的书”。从此后,她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索尔仁尼琴的健康祈祷。为了这本书,她在2007年索尔仁尼琴准备接受成功率50%的颈动脉大手术前,鼓励他坚定信念,手术终获成功。为了这本书,她甚至去过索尔仁尼琴流亡时长期居住的美国佛蒙特州的一个小村庄。她考察了索尔仁尼琴住过的房子,走访了所有当时的邻居,还看到了村里唯一一家日用品商店里保存至今的告示:未穿衬衫者不得进入本店!赤脚者不得进入本店!本店不负责为寻找索尔仁尼琴住处者指路!2008年3月5日,《索尔仁尼琴传》终于正式出版,索尔仁尼琴等到了亲眼见到这本书的那一天。之后这种写作访谈的状态又持续到该年7月,8月3日索尔仁尼琴去世。她把索尔仁尼琴最后的岁月及去世后的葬礼、各国评论等补充到传记中,形成了《索尔仁尼琴传》第二版的内容。萨拉斯金娜说她至今没有受到任何关于文中错误之处的指责,她受到的惟一指责是她太爱传主了。“我和他这么近距离地一起工作了13年,怎么可能不爱他呢?他是那么睿智,宽容,他从来没有提出要求让我把写好的部分拿给他看……他甚至很少在我打印出来请他更正错误的初稿上涂改。”

完成《索尔仁尼琴传》之后,萨拉斯金娜又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之邀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的写作。虽然陀氏生活的年代已相去甚远,但她依然秉持从事事实和证据出发的原则,凡是不能得到确证材料的说法她都不会给出定论。她感觉自己不仅是一个研究者,而更像是一个追根溯源的侦查员。她笑言写作陀氏传记还伴随着另一种担心:害怕被那些研究陀氏的同行骂死弄死。结果恰恰相反,传记出版后得到了很多好评,同样没有被指出任何错误之处。

与萨拉斯金娜研究哪个作家就对之全心热爱和赞美的情感不同,瓦尔拉莫夫对自己的传主常常抱持审视甚至是批判的态度。他在《代际链条中的人:关于传记体裁》的演讲中,引用了霍达谢维奇的话:“我认为我的(并不轻松的)责任在于——从讲述中去除思想的伪善和言语的畏惧。不要期待我的笔下能描绘出圣像般的、人尽皆知的形象。这种形象于历史无真实。我相信,这样的形象也是不道德的,因为对于一个卓越人物,只有真正、完整地描绘才能发现他身上的优秀之处……应当学会尊敬和爱戴一个带着他全部弱点的卓越之人,有时甚至要出于所有这些弱点而去尊敬和爱戴他。这样的人不需要伪饰。他要求于我们的其实更难:全然的理解。”瓦尔拉莫夫与传主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对这段话的最佳阐释。一方面,他对阿·托尔斯泰、普里什文、布尔加科夫等冷静分析或嘲讽评判;另一方面,他又对他们身上的弱点、不当的言行举措暴露出同情甚或理解。例如,他既说普里什文是把小说当成生命度过的一生,又指出其写出《奥苏达列娃之路》这样的应时之作完全是出于沽名钓誉之心;他既说普里什文是个胸怀狭窄的人,又肯定他在曾经对自己的作品提出尖锐批评的普拉东诺夫极需帮助时拯救了后者。作为传记作者,他既重视材料的真实可靠和丰富详实,同时又告诫读者什么都不要相信,无论是日记、书信还是回忆录,甚而断言三者不可信的程度依次增高。他就像一位审慎的、或许有些冷酷的侦探家,拨开时光结成的蛛网一点点发现真实,一片片串连起传主尘封的往事,为读者还原一段复杂交错的历史。

作家传记: 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热门体裁

□侯玮红